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李學勤 主編

肩水金關漢簡研究

郭偉濤／著

肩水金關漢簡是繼居延舊簡、居延新簡之後，在今甘肅金塔縣—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帶出土的又一批重要簡牘。本書圍繞肩水金關漢簡，結合居延舊簡、居延新簡、額濟納漢簡、地灣漢簡等，深入系統考察了張掖郡肩水都尉府所轄邊塞的建制情況。不僅考證諸候官塞的部隧設置，澄清肩水候、東部候長、“置”等長吏或機構的駐地問題，辨析部分簡牘的出土地，還在此基礎上探明金關簡的性質問題，為學界正確利用此批重要資料奠定基礎。附錄書評試對包括古井簡、墓葬簡在內的出土簡牘之研究提出新看法，藉以體現作者的學術視野。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李學勤 主編

肩水金關漢簡研究

郭偉濤／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肩水金關漢簡研究 / 郭偉濤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325-9211-1

I. ①肩… II. ①郭… III. ①居延漢簡—研究 IV. ①K877.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069899 號

肩水金關漢簡研究

郭偉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0.25 插頁 2 字數 332,000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211-1

K·2647 定價: 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叢書前言

“出土文獻”是與“傳世文獻”相對的概念，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簡牘帛書等。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始於漢代，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這兩千多年裏，出土文獻層見疊出，研究工作不斷走向深入。孔壁中經、汲冢竹書、商周金文、殷墟甲骨……每一次重大的發現，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那個時代的學術生態。

1925年，清華研究院的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首倡“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他所謂的“紙上之材料”即傳世文獻，“地下之材料”就是出土文獻。通過出土文獻來印證補正傳世文獻，開闢研究中國古史的新途徑，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真諦。“二重證據法”是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對近代學術的影響至為深遠。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從境外搶救入藏了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總數約2500枚，其中有多種經、史典籍，非常珍貴，其重要性堪與孔壁中經、汲冢竹書相媲美。9月，清華大學成立了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心的定位是：通過開展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叉性和合作性研究，深入探討出土文獻的保護、整理、研究的前沿課題，把中心建設成為具有世界領先水準的出土文獻研究和保護中心。當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對清華簡進行保護、整理與研究，同時開展其他出土文獻的保護和研究工作。中心自成立以來，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別是在清華簡的保護、整理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領導的肯定和學術界及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

2011年4月，在清華百年校慶前夕，中心領銜申報的“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獲批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2012年5月，為回應教育部2011計劃，中心聯合國內11家兄弟單位組織籌建“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2013年1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

在短短的五年內，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經歷了跨越式的發展，在領導的關懷支持和同人的集體努力下，做出了一些工作成果，然而不足之處仍然是明顯的。我們的學識經驗都很有限，面對任務的要求，時時感到自己存在的缺憾。我們深切期待着各方面的幫助和指教。

不管中心如何發展，我們始終圍繞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這個主旋律。

為了集中展示近年來出土文獻研究的最新成果，推進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輯了這套“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叢書將先推出20種，作者包括中心和其他單位人員，都是活躍於一線的中青年學者，所涉及的出土文獻時間跨度很大，所涉及的學科領域相當寬廣，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當今出土文獻研究的主流面貌，相信廣大讀者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啓示。

這套叢書的編輯，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積極回應，更有幸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李學勤

2013年10月

序

今天(2019年5月6日)微信裏傳來消息,國家文物局召開“考古中國”重要進展工作會,會上公佈了4項重要成果,其中2項湖北荊州墓葬考古成果,在一座戰國墓和一座西漢墓中分別出土了324枚楚簡和4546枚西漢簡牘,內容頗為豐富。地不愛寶,自1901年以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中國各地出土的戰國到魏晉時期的簡牘,粗略統計,將近28萬枚。尤其是近二十年,更如雨後春筍,應接不暇。近幾十年來戰國秦漢史的快速發展離不開這些簡牘。

這則新聞在刷屏的同時,也引發了一些學者的擔憂。一位老友在轉發新聞的同時,不無憂慮地寫道:“近年簡牘的不斷發現和迅速刊佈,在數量和信息量上遠超過早期發現的出土文獻,是秦漢史研究者的幸事。我卻有一種莫名的恐慌:我們是否能真正完全瞭解這些信息?我們通過邏輯分析絞盡腦汁得出的結論,是否轉眼就被一條新材料給否定掉?大家為這些材料狂喜的時候,我卻有些懷疑我們的工作是否有意義?”情緒有點悲觀。有這種擔心的,恐怕不會只有一位。回顧簡牘研究的學術史,從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筭路藍縷,開創基業,只是到了1998年湖北荊州郭店楚簡以及2001年張家山漢簡的公佈,才點燃了學界的熱情,普遍重視與利用簡牘,簡牘研究躍升為國內國際學界的“顯學”。資料發現如井噴,研究成果似潮湧,場面驚人,形勢喜人。

喜中有憂。不止是材料的關注度上有差別:典籍簡頗受青睞,文書簡關注有限,方法上的思考卻頗為少見。百餘年來,簡牘研究成果雖多,但方法上有啟發性的論著卻不多見。需要不斷返回這些有引領性的著作,汲取營養與靈感,結合新資料,探索與發明更為適用的方法,讓沉睡數千年的遺物吐露更多的信息。

簡牘研究史上,除了津津樂道的《流沙墜簡》,最值得注意的是陳夢家的《漢簡綴述》。他在三四年間完成的十幾篇論文,達到了時代的巔峰,此前他卻從未接觸過漢簡。只因1960年被夏鼐所長安排去整理武威漢簡,興趣因此陡然轉向了漢簡。一發不可收拾,始於新月派的詩人,終於邊塞將士的斷爛簿籍文書。隨志趣轉換,不斷開辟新天地。陳夢家的成功,得益於他繼承並超越了“二重證據法”。文獻之外,更注意結合考古學、文書學治簡,以歷史學的視野,自最基本問題入手,循序漸進,重建歷史現場,成就了居延漢簡研究的一座豐碑。

看來悖論的是,陳夢家能取得如此成績,恰在於他不是研究秦漢史出身,沒有《史記》《漢書》的包袱,不執著於傳世文獻與簡牘的對應。他在秦漢史研究上的成就,無法與勞幹比肩,漢簡研究所達到的深度與提出的問題,遠超勞幹。陳夢家學法律出身,涉足歷史後,宗教、神話、文字而甲骨、青銅器,沒有多少傳世文獻可依憑,以文獻為中心的思維慣性影響有限,只有注重探索資料內在的關係。接觸漢簡時,一般認為的劣勢反而成為了優勢,是“失”亦是“得”,將精力放在重建簡牘內在的關聯上,構建出成片的新天地。換言之,不能祈求一把鑰匙開一萬把鎖,需要針對資料與問題,開發適當的方法。

日本方面,這方面的代表莫過於漢簡研究的開創者森鹿三。他留下的漢簡研究論文不過17篇,收在《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篇》(同朋舍,1975)中,幾乎篇篇都充滿了啟發。1953年發表的《關嗇夫王光》,短短二頁。1955年發表《令史弘に關する文書》稍長些,兩篇以某個人物為中心的研究,成為後來按照人物集成研究的濫觴。後來還發表過關於“馬”的研究、關於王莽簡書寫特點的分析,以及簿書的集成研究。他雖然沒有做過冊書復原,但對居延舊簡中57.1這由三枚簡構成的冊書做過十分詳細的分析(《居延出土の一冊書について》),從一開始接觸居延,就高度重視形制與材質,與中國學者的旨趣頗有異樣(見《居延漢簡研究序說》),大庭脩、永田英正與魯惟一等第二代學者的成果,幾乎都是位於森鹿三的延長線上。目前研究中國簡牘的日本學者已經進入了第四代,年輕學者的研究中森鹿三的影子還依稀可見。

去年9月,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召開的“第三屆簡帛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上,曾提交一份發言提綱,談簡牘研究的五個層次。指出簡牘研究至少需分為考古學、文字學、文書學、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五個層次,各層次之間大致先後遞進,前面的問題沒有解決好,後面的研究難以扎實推進。

中國簡牘研究的問題在於，立基傳世文獻開展史學研究的傳統悠久深厚，利用出土資料偏愛二重證據法，習慣性地兩相比對，尋求解決史學問題。兩類資料產生、流傳與留存的背景差別甚大，難以匆忙對應，不然的確會產生“輕易立說”之弊，“疲簡牘，煩後生”。對出土資料進行前三個層面的研究必不可少。不過，那時感覺看法還很粗糙，當場報告的則是另外一篇實證研究。現在借給偉濤大作寫序之機，贅述幾句，求教於學界。

郭偉濤君 2013 年秋入清華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2017 年夏畢業，旋入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跟隨李守奎與李均明先生從事博士後研究，前後近六年。偉濤本科學習生物工程，碩士階段轉入秦漢史，不過重在思想史。入清華後，因上課而開始接觸簡牘，逐漸深入堂奧，最終以金關簡作為研究對象，完成了畢業論文。恐怕是金關簡公佈後全面研究的首部博士論文，答辯時得到專家的肯定。論文通過後，又經修改完善，由趙平安老師推薦，得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賀。

短短數年，偉濤能夠走到金關簡研究的前沿，首先要感謝張德芳先生領導的整理團隊，幾年間將全部資料公佈，奠定了研究的基礎。其次，方法得當亦是重要保障。除了上課，偉濤積極參加清華以及北京多所高校舉辦的讀簡班，並認真學習了《流沙墜簡》以來有方法論意義的簡牘研究論著，得以快速攀到前沿。偉濤自己肯下功夫，善於學習，轉益多師，積極求教，高效地完成了論文。未來要想取得更大的成績，從根基入手，方法上不斷思考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偉濤的研究側重基於文書學考察漢代張掖郡屯戍制度。“風物長宜放眼量”，期待他能繼續努力，由簡牘到制度，再到人——卷入邊地生活的吏卒百姓，邁向更為豐富的史學研究。進而將漢簡由研究對象發展為觀察漢帝國的視角，長安之外，提供透視西漢王朝的新基點。更希望他加強文字學訓練，彌補文字釋讀上的短板，同時放眼世界，從西漢的邊陲到羅馬帝國的邊陲，中外比較中加深對漢朝的認識。出色的學者，既需要不斷推出嚴謹扎實的成果，也需要不斷超越自己，發現更廣闊的世界，祝願偉濤在學術道路上勇猛精進，再攀高峰。

是為序。

侯旭東

2019 年 5 月 6—7 日於京北安寧莊

目 錄

序	1
凡 例	1
緒 論	1

上編 漢代張掖郡肩水都尉防區機構設置研究

序 說	11
第一章 肩水塞部隧考	14
第一節 存續時間	14
第二節 諸部	16
第三節 諸隧	39
第四節 部、隧隸屬	46
第五節 餘論	57
第二章 橐他塞部隧考	65
第一節 存續時間及轄區	65
第二節 南、中、北三部	70
第三節 諸隧及部、隧隸屬	73
第四節 餘論	78
第三章 廣地塞部隧考	82
第一節 存續時間	82

第二節 部、隧及隸屬	87
第三節 餘論	89

下編 漢代弱水中下游流域邊防機構駐地研究

序 說	95
-----------	----

第四章 肩水候駐地考	99
第一節 封檢所見肩水候駐地	99
第二節 文書所見肩水候駐地及時間	102
第三節 郵書刺所見肩水候駐地	127
第四節 塞尉駐地	136
第五節 小結	141

第五章 肩水塞東部候長駐地考	150
第一節 A32 遺址出土東部候長封檢	150
第二節 A32 遺址出土的候長楊	152
第三節 A32 遺址出土東部候長相關文書	153
第四節 A32 遺址出土候史相關簡牘	159
第五節 餘論	160

第六章 弱水中下游流域邊防系統的“置”	163
第一節 肩水地區的“置”	164
第二節 居延地區的“置”	173
第三節 論“置”	177
第四節 餘論	185

附 錄

金關簡第五冊 73EJD 部分簡牘出土地獻疑	189
舩山明、佐藤信編《文獻と遺物の境界》(第一、二冊)評介	220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表	243
參考文獻	288

附 圖

附圖一	河西漢塞走向示意圖	305
附圖二	漢代弱水中游亭塞遺址分佈圖	插頁
附圖三	A32 遺址平面圖	306
附圖四	A32 遺址發掘區分佈圖	306
附圖五	A33 遺址郭城平面圖	307
致 謝		308

緒 論

爲斷匈奴右臂、隔絕羌胡，^①漢武帝在河西地區發動了一系列戰爭，攘地斥境，加以昭宣之世的經營，漢廷基本牢牢控制了河西地區。在這一廣大地域內，漢廷列置郡縣徙民屯墾。與此同時，在東起今蘭州市西，西至敦煌西北，北達今內蒙古額濟納旗的範圍內，沿交通要道及重要屯田區外緣分次分段修築了亭塞障隧，^②通烽火謹斥候，建立了完備的警戒候望系統（書末附圖一）。

河西四郡之一的張掖郡，基本上囊括了整個弱水流域。^③當時，弱水上下游流域（今稱額濟納河）的氣候較今天更爲濕潤，水資源亦更爲豐富。^④中游流域的今金塔縣東部及下游的今額濟納旗等地，分佈著大小不等的綠洲，適宜屯墾。^⑤而沿弱水往北可達今蒙古高原，直抵匈奴腹地，漢軍往往從此地北出。^⑥可以說，這一地區不僅是抵禦匈奴侵擾的前綫和橋頭堡，亦是北擊匈奴的基地和重要據點。

張掖郡北部，被劃爲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兩個防區。前者統轄肩水塞、橐他塞、廣地塞等，後者統轄甲渠塞、卅井塞、殄北塞等。各候官塞再劃分爲若干部，每部管轄若干亭隧。亭隧堪稱漢代西北邊防的最基層單位，承擔最

① 班固認爲，“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見《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班固贊”，中華書局，1962年，第3928頁。

② 吳初驥《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6—17頁；賈文麗《漢代河西經略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44—149頁。

③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將弱水流域的絕大部分都劃入張掖郡，但靠近會水縣東部地區的弱水流段劃歸酒泉郡（第二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33—34頁），這一處理方式受到石昇烜質疑（《何處是居延——漢代居延地名移動與行政區劃變遷》，《史原》復刊第5期，2014年，此據《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四輯，2015年，第96—101、128—129頁）。

④ 孔昭宸、杜乃秋、朱延平《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漢代烽燧遺址的環境考古學研究》，《環境考古》第一輯，1991年，第120—121頁。

⑤ 胡耀文、余林、汪桂生、王學強、史志林《黑河流域漢代墾殖綠洲空間分佈重建》，《蘭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49卷第3期，2013年，第306—312、319頁。

⑥ 太初二年，“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萬餘級。”見《漢書》卷六《武帝紀》，第203頁。

基礎的日常防禦任務。從內地徵調過來以及河西當地的士卒，被統一調配在這一廣大地區服役執勤，烽燧遺址因此也留下衆多簡牘文書。這些基層屯戍檔案反映的邊塞歷史畫面，遠較正史勾勒的輪廓更爲豐富清晰，爲深入認識漢代邊塞及相關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一、概念界定

這裏主要界定一下學界常用的“塞”與“候官”兩個概念。

河西漢塞主要是由紅柳、蘆葦、沙礫壘築的牆垣，輔以塹壕、天田，甚至繩索、柵欄，並結合河流、湖泊、沙漠等天然屏障，而共同組成的防禦設施。^① 本書所謂的肩水塞、橐他塞、廣地塞等等，並非單指物理意義上的軍事防禦設施，而是指各軍事防禦機構。比較而言，更近於政區、轄區的概念。

至於候官，一般由被視爲塞候居所的障，連同隨侍在側的文書吏、鄣卒等人員，及相應的附屬設施所處的塢院共同組成，建築規模通常比亭隧及候長治所要大一些。如肩水候官，嚴格意義上，是指肩水塞的長官——肩水候——的官署，即其日常辦公及處理政務的衙署。^② 換言之，肩水塞與肩水候官，類似於縣與縣廷、郡與太守府的關係。^③ 本書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塞、候官的概念。

當然，簡牘中亦零星出現“候官塞”的用法，如甲渠候官塞（110.8/A8、156.4/A8、160.11/A8、185.10/A8）、肩水候官塞（239.82/A33）等，含義完全

① 吳初驤《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第182—183頁。

② 《周禮·秋官·士師》，鄭玄注“官，官府也”，賈公彥疏曰“謂廬，官人聽事之門”（鄭玄注、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周禮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47—1348頁）。

③ 當然，因候官爲塞候的衙署，故在日常文書行政中，亦出現以候官代指塞的情況，尤其是以塞爲單位編制的各種簿籍，往往以候官代替。如下：

● 甲渠候官建始四年十月旦見鐵器簿口

EPT52：488

● 甲渠候官五鳳四年戌卒定羅物故名籍口

EPT53：37

肩水候官執胡隧長公大夫奚路人，中勞三歲一月，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卅七歲，長七尺

五寸，氐池宜廩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

179.4/A8

口甲渠候官第十八隧長公乘張護口

始建國二年功勞案

EPT4：50

前兩簡甲渠候官的簿籍，當指整個甲渠塞，並非單指甲渠候所駐的鄣城。後兩簡使用“候官+隧”，顯然候官是指塞。不過，爲了行文與表述的方便，筆者使用嚴格意義上的肩水塞、肩水候官的概念。

等同於甲渠塞、肩水塞。此前陳夢家認為候官塞的稱呼僅見於王莽時期，^①實際上，早在宣帝時期就已出現。^② 本書統一使用簡稱，行文中偶用“候官塞”的全稱。

二、弱水中下游流域遺址調查

本書處理的主要材料是弱水中下游流域出土的簡牘，^③所涉及的問題基本也在弱水中下游流域，因此有必要回顧這一廣大地域內的遺址調查與發掘工作。

最早前往該地遊歷與科考的，是 20 世紀初期入華探險的西方學者。1907 年，斯坦因曾在金塔一帶短暫考察。^④ 1908 年，科茲洛夫前往弱水下游，發現西夏黑水城遺址。^⑤ 1914 年，斯坦因順弱水北上，直到今內蒙額濟納旗，雖亦零星拾獲漢簡，但其主要成果集中在西夏、蒙元時期遺址遺物的考察發掘方面。^⑥

西方探險家在中國西北邊疆的考察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注意。1930 年前後，由中國、瑞典等多國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對我國西北邊疆進行了多學科的大規模科學考察。其中，斯文·赫定泛舟弱水及其尾間湖泊，^⑦徐旭生、劉衍淮等考察了弱水中下游流域的遺址。^⑧ 貝格曼不僅掘獲

① 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原刊《考古學報》1964 年第 1 期，此據作者《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 年，第 51、55 頁。

② 新刊金關簡顯示，早在宣帝朝，即有稱“肩水候官塞”者，如下：

張掖肩水候官塞有秩候長公乘殷禹 元康三

73EJT21：62

這類用法亦屬少數，書中盡量避免採用。爲了與轄下諸部塞相區別以及表述的方便，亦偶稱“候官塞”。

③ “弱水”的具體所指，目前似無定論。發源於祁連山，流經甘肅、內蒙古，最後注入今額濟納旗蘇果淖爾和嘎順淖爾的這條內陸河，在甘肅境內，今天一般稱爲黑河，內蒙境內稱爲額濟納河。爲表述方便，依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年），統稱爲弱水。

④ 奧雷爾·斯坦因《亞洲考古圖記》，1921 年初版，此據巫新華等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645—647 頁。

⑤ 彼·庫·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1923 年初版，此據王希隆、丁淑琴中譯，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58—82 頁。

⑥ 奧雷爾·斯坦因《亞洲腹地考古圖記》，1928 年初版，此據巫新華等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565—728 頁。

⑦ 斯文·赫定《亞洲腹地探險八年（1927—1935）》，1943 年初版，此據徐十周等中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13—145 頁。

⑧ 徐旭生《徐旭生西遊日記》，1930 年初版，此據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81—158 頁；劉衍淮《額濟納河沿岸漢代邊防的遺迹》，《師大學報》第 12 期，1967 年，第 129—137 頁；劉衍淮《額濟納河居延海與黑海的考查》，《師大學報》第 15 期，1970 年，第 223—231 頁。

大量漢簡，^①而且對額濟納河沿岸的考古遺址進行了系統科學的勘察，後來相關考察報告亦整理出版，^②是正確認識這一地區的屯戍組織體系的基礎。

1949年後百廢待興，該地區遺址的勘察，一直延宕至20世紀70年代才提上日程。1973、1974年間，甘肅居延考古隊在A32、A8、P1等遺址掘獲大量漢簡，^③並進行了系統的考古勘察，增進了對候官、亭隧、關卡等漢代防禦設施的建築佈局及結構的認識。^④20世紀80年代前後，甘肅方面又進行了數次小規模的調查。^⑤198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所在A33遺址開方發掘，進一步明確了肩水候官的建築結構，並獲得七百多枚漢簡。^⑥1997年，宮宅潔、角谷常子及冨谷至、藤田高夫等日本學者對弱水中下游、疏勒河南岸及敦煌和安西之間的漢代遺址進行了考察。^⑦2000年前後，內蒙古文保部門對弱水下游地區的多個遺址進行了勘察，不僅獲得數百枚漢簡，且解剖了數座漢代亭隧。^⑧2001年，內蒙古文保部門與吉林大學邊疆考古中心又協力

① 這批漢簡，習稱為居延舊簡。本書使用的居延舊簡，主要據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貳、叁、肆）》（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2015、2016、2017年），兼參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勞榘《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年）及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下文不再一一出注。

② 弗克·貝格曼考察，博·索瑪斯特勒姆整理《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1956、1958年初版，此據張德芳等中譯，學苑出版社，2014年。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整理這批漢簡時，據此書及調查，重新梳理了弱水中下游流域的遺址，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附錄—《額濟納河流域障隧述要》，中華書局，1980年，第298—319頁。

③ 這次發掘漢簡，主要包括居延新簡及金關漢簡。本書所引居延新簡，主要據張德芳主編《居延新簡集釋（1—7）》（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同時參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華書局，1994年）及馬怡、張榮強主編《居延新簡釋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金關漢簡，全部引自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壹、貳、叁、肆、伍）》（中西書局，2011、2012、2013、2015、2016年）。

④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第1—25頁及附圖。

⑤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額濟納河下游漢代烽燧遺址調查報告》，收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84頁。初世賓《居延考古之回顧與展望》，岳邦湖《居延地區漢代長城烽燧考古回顧》，兩文收入甘肅省文物局、絲綢之路雜誌社編《甘肅文物工作五十年》，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30—146、171—176頁。

⑥ 吳伯驥《河西漢墓調查與研究》，第162—164頁。這批簡牘見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分中心編《地灣漢簡》，中西書局，2017年。

⑦ 宮宅潔《エチナ河流域の諸遺迹（エチナ河下流域）》，角谷常子《エチナ河流域の諸遺迹（毛目地域）》，兩文皆刊於《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22卷，2005年，第17—33、35—42頁。後文電子版，承角谷先生賜下，謹致謝忱！

⑧ 這批漢簡通稱額濟納漢簡，本書主要據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及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

對下游部分遺址進行了測繪。^① 2006 年 8 月，國內學者對弱水下游的部分遺址進行了簡短考察；^② 9 月份，水間大輔、柿沼陽平等日本學者亦踏足此地。^③ 此後，有學者勘察了金塔縣境內的 A35 遺址。^④ 2009 年 8 月，日本學者前往弱水下游考察。^⑤ 此外，吳初驥對弱水中下游流域障隧遺址的建築結構、位置及分佈規律等問題進行了綜合研究，堪稱這一領域的集大成工作，為後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⑥ 森谷一樹對北部居延地區亦有研究。^⑦

該地區遺址考察的一大亮點，是衛星定位（GPS）及遙感成像（Google Earth）等新技術的引進。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臺灣簡牘學會數次前往弱水中下游流域進行考察。羅仕杰首次利用 GPS 考察弱水流域遺址，系統測定了諸遺址的經緯度及彼此間直線距離，為精確研究諸遺址的分佈奠定了基礎。^⑧ 此後，景愛利用衛星成像技術考察了弱水下游綠洲的演變。^⑨ 邢義田利用 GPS 與 Google Earth 重新測定了諸遺址經緯度及間距，並藉此重新比定了部分遺址的命名及定位。^⑩

三、文書簡研究方法述評

本書涉及的資料，是以金關簡為主的居延漢簡，屬於所謂的文書簡。而對文書簡展開研究，除採用最為傳統的以王國維、勞榘為代表的簡、史互證

- ①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額濟納古代遺址測量工作簡報》，《邊疆考古研究》第七輯，2008 年，第 353—369 頁。
- ② 郝樹聲《居延考察日記》，收入張德芳、孫家洲主編《居延敦煌漢簡出土遺址實地考察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68—285 頁。
- ③ 水間大輔、柿沼陽平、川村潮、楯身智志《居延漢代烽燧・城邑遺址等踏查記》，《長江文化流域研究所年報》第 5 號，2007 年，第 417—418 頁。
- ④ 岳岩敏、林源《漢居延東大灣城遺址勘察與研究》，《建築與文化》2015 年第 10 期，第 90—92 頁。
- ⑤ 中村威也《額濟納調查報告記》，見初山明、佐藤信編《文獻と遺物の境界——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研究》，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1 年，第 3—19 頁。
- ⑥ 吳初驥《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第 132—170 頁及附圖三。
- ⑦ 森谷一樹《黑河下流域の遺迹群》，《アジア遊學》99 號特集《地球環境を黑河に探る》，2007 年，第 98—105 頁；森谷一樹《居延オアシスの遺迹分布とエチナ河》，見井上充幸、加藤雄三、森谷一樹編《オアシス地域史論叢：黑河流域 2000 年の點描》，松香堂，2007 年，第 19—38 頁及附圖；森谷一樹《前漢—南北朝時代の黑河流域》，見中尾正義編《オアシス地域の歴史と環境：黑河が語るヒトと自然の 2000 年》，勉誠出版，2011 年，第 11—48 頁。森谷一樹先生代為掃描前兩篇文章，謹致謝忱！
- ⑧ 羅仕杰《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衛星遙測研究》，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
- ⑨ 景愛《古居延綠洲的消失與荒漠化——從考古和衛星遙感觀察》，《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2 期，第 43—49、55 頁。
- ⑩ 邢義田《全球定位系統（GPS）、3D 衛星影像導覽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邊塞遺址研究——以額濟納河烽燧及古城遺址為例（增補稿）》，收入作者《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中華書局，2011 年，第 205—257 頁。

的思路外，^①更須從簡牘內部尋找規律，摸索方法。因此，有必要回顧文書簡研究的經典方法。

通常而言，無論是留底的檔案，還是運行中的簿籍文書，其原始形態應當是編連成冊的。而目前所見，除極少數保持著冊書的完整形態外，大部分都散亂無章。因此，在處理殘篇斷簡時，有必要優先將之恢復到原來的冊書狀態，這就是冊書復原。大庭脩在此方面有開創性貢獻，成功復原元康五年詔書冊，^②並總結了“出土地點相同、筆迹相同、形制相同、內容相關”的四項原則。^③在此基礎上，不僅明確了漢代詔書下發到地方的運行流程，而且更新了學界對御史大夫職掌的認識。此研究提示我們，先行冊書復原，然後可據此考察文書行政的流程、相關機構的職掌與管理運行的細節，極大地拓展研究深度。可以說，這正是冊書復原的目的和魅力所在，非殘篇斷簡所可達到。不過，限於條件，其成果至今複製不易。此外，徐蘋芳、謝桂華對簿籍類文書的復原作了不少工作，^④然因考古發掘及出土信息的欠缺，簿籍類文書無法完全恢復舊觀。

冊書復原的方法，亦可應用於其他地點出土的簡牘。侯旭東將之用於古井出土的吳簡的研究，根據出土整理時繪製的揭剝圖復原了“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中“廣成里”的部分，並據此討論了冊書的構成與編排順序。^⑤不過，這次工作忽略了竹簡形制與書式的差異，為鷲尾祐子所指出。^⑥侯旭東又在鷲尾祐子的基礎上進行了基於冊書復原的集成研究，並結合漢簡與傳世文獻探討了簿籍的製作與性質，探討了官府控制吏民人

①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1944年初版，此據作者《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第1—76頁。

② 大庭脩《居延出土的詔書冊與詔書斷簡》，原刊於《關西大學學術研究所論叢》52卷，1961年，此據中譯，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34頁。

③ 大庭脩《漢簡研究》，1992年初刊，此據徐世虹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0—20頁。

④ 陳公柔、徐蘋芳《瓦因托尼出土糜食簡的整理與研究》，1963年9月完成，刊於《文史》第十三輯，1982年，此據徐蘋芳《中國歷史考古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6—385頁；謝桂華《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原刊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五輯，1992年）、《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續）》（原刊《簡帛研究》第一輯，1993年）、《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和冊書復原》（原刊《簡帛研究》第二輯，1996年），此據作者《漢晉簡牘論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7—56、57—73、74—95頁。

⑤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復原的初步研究》，原刊於《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此據作者《近觀中古史》，中西書局，2015年，第81—107頁。

⑥ 鷲尾祐子《長沙走馬樓吳簡連記式名籍簡的探討——關於家族的記錄》，《吳簡研究》第三輯，2011年，第65—87頁。